

HUMANITIES  
AND  
SOCIETY



人文与社会译丛

THE SENSE OF REALITY

# 现实感

观念及其历史研究

*Isaiah Berlin*

[英国] 以赛亚·伯林 著 潘荣荣 林茂 译

刘东·主编 彭刚·副主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HUMANITIES AND SOCIETY

# 现实感

## 观念及其历史研究

*Isaiah Berlin*

[英国] 以赛亚·伯林 著 潘荣荣 林茂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英)伯林(Berlin, I.)著;潘荣荣,林茂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1. 1

(人文与社会译丛/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 The Sense of Reality

ISBN 978-7-5447-1581-2

I. ①现… II. ①伯… ②潘… ③林… III. ①欧洲-历史-研究  
IV. ①K50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5093号

The Sense of Reality by Isaiah Berlin

Copyright © Isaiah Berlin 1996

Selection and editorial matter © Henry Hardy 1996

Introduction © Patrick Gardiner 1996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 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5-229号

书 名 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  
作 者 [英国]以赛亚·伯林  
译 者 潘荣荣 林 茂  
责任编辑 李瑞华  
原文出版 PIMLICO, 1997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1.25  
插 页 2  
字 数 240千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581-2  
定 价 30.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 主 编 的 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囿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

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作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 编者前言

在过去六年中,我有幸收集和编辑了以赛亚·伯林过去六十多年里大量未发表的作品:论文、致辞、演讲、广播稿和讨论(这些种类当然彼此也有重叠)。我掌握的原始资料包括有时很难懂的手稿、打字稿、录音(常常没有稿子)<sup>①</sup>,以及后来没有保存下来的那些录音的准确性各异的转写稿。我收集起来准备有选择地发表的打字稿在文字量上(大概有一百万字)几乎和伯林迄今已发表的作品相当。

从汇集的这些材料中抽出来的、分别关于约瑟夫·德·迈斯特和J.G.哈曼<sup>②</sup>的两篇专题长文已经出版,本书所选的九篇文章也出自这些材料。它们与之前的文章有三个相同的特点:第一,它们是以差不多已完成了的手稿的形式存在的,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大部分手稿在写作的时候伯林还是认为能够发表的,但出于某种原因最后并未出版。第二,在我看来,并且在其他读过的人看来,恰当地说,这些文章完全应该加入伯林已发表的作品当中去。最后,它们在主题上都是相互关联的,都以实例说明了他对观念及其历史的核心关注,正如我给这本书所加的副标题

---

① 我已经将录音的拷贝存在伦敦国家声音档案馆。

② 一篇是《约瑟夫·德·迈斯特与法西斯主义的起源》,与其他七篇已发表但未成集的文章被收在《扭曲的人性之材:思想史断章》(伦敦,1990;纽约,1991)一书中;另一篇收在《北方的占星家:J.G.哈曼与现代非理性主义的起源》(伦敦,1993;纽约,1994)。

ix 所表明的。我的希望是,更多未发表的材料在不久都会顺利面世,而且伯林更多的已发表但迄今未成集的作品能够结集出版。还有,除了少数例外——主要是他关于苏联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文章——现在这本书,加上以前的八本<sup>③</sup>,能够完整地收集他写得比较成形的、相对较长的文章。

我现在谈谈这些文章的来源。《现实感》是首次伊丽莎白·卡特尔·摩罗讲座的基础,1953年10月9日在马萨诸塞州北安普顿的史密斯学院以《史学中的现实主义》为题发表;其中讨论的一些问题伯林已经在别的地方,比如《刺猬与狐狸》、《科学历史学的概念》等作品当中有所涉及,但这是他对这个问题的最明确讨论,显然在这本集子中值得占一席之地。《政治判断力》一文和《现实感》有某些关联点,不过完全是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这是1957年6月19日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第三套节目首播的一次谈话(以《思考政治》为题的七次系列谈话中的第六次):文章内容是基于事先准备的讲稿和广播录音之上的。《哲学与政府压制》是一次演讲,是为一个主题为“人类思考和表达的自由”的系列讲座准备的,这个讲座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建校两百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演讲时间安排在1954年3月24日,但最后伯林并未能参加。《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与其他各篇都不一样,它一写出来就发表了:首次发表在《钱伯斯百科全书》(伦敦,1950;纽恩斯出版社;纽约,1950;牛津大学出版社

---

③ 除了前注中提到的两册外,早先已有六册文集以零散的方式先后发表。它们是《自由四论》(伦敦、纽约,1969)、《维柯与赫尔德:思想史专论两篇》(伦敦、纽约,1976)、《俄国思想家》(伦敦、纽约,1978)、《概念与范畴:哲学论文集》(伦敦,1978;纽约,1979)、《反潮流:思想史论文集》(伦敦,1980;纽约,1981)。[由这六本书以及《扭曲的人性之材》中选出的一些文章结集成的《对人类的适当研究:文集》一书现已出版(伦敦,1997)。]

社),经过修改后又发表在同一部书的下一版里(牛津、纽约等,1966:帕格蒙出版公司);现在的版本加入了为新一版百科全书所作的修改,但这个新版本并没有问世,它被收入本书部分是因为它以前从未被收入文集,部分也是因为它的主题合适。《马克思主义和十九世纪的国际工人协会》是1964年在斯坦福大学第一国际工人协会一百周年纪念会议上发表的演讲的基础。《浪漫主义革命》是为1960年在罗马的一次会议而写的,在那儿是经过意大利语翻译后发表的:在本书长久的酝酿过程中,此文的意大利文版发表在斯蒂芬·鲁克斯所编的伯林文集《在哲学与观念史之间:传论式访谈》(*Tra la filosofia e la storia delle idee: intervista autobiografica*)一书中(佛罗伦萨,1994:庞特·阿尔·格拉齐出版社),英语原文的荷兰语和德语译稿分别发表在《关系》和《国际文学》上。《艺术的责任》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最初在美国所做的一次谈话的修订版。《康德:一个鲜为人知的民族主义源头》是首次胡马云·卡比尔纪念演讲,1972年在新德里发表。《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与民族意识》也是1961年11月13日在新德里一次纪念泰戈尔百年诞辰的大会上发表的。

和以前几本书的情况一样,我得到了一些学者慷慨的、不可或缺的帮助,我非常感谢他们。帕特里克·加迪纳(他还为本书写了精彩的导言)和罗杰·豪泽尔阅读了我选出来的所有文章,包括一些我没有读的他们也都读了,而且帮我作了遴选,解决了一些具体的文本问题。G. A. 柯亨教授阅读了有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那些篇章,并作了评论,而且帮我说服伯林,让这位对自己的作品有着无可就药的怀疑的作者相信,应该把它们收进去;特里尔·加伏尔教授以其丰富的学识给予了许多慷慨帮助,使我能够给后一篇文章加注。加纳·贝克尔博士关于费希特、安德鲁·罗宾逊关于泰戈尔、弗兰克·西黎教授关于屠格涅

夫、拉尔夫·沃克尔博士关于康德、海伦·迈科蒂关于几个俄国问题,都给予了非常宝贵的帮助。德瑞克·奥弗德随时向我提供关于别林斯基和其他俄国作者的专门知识,显示了真正的慷慨、耐心和效率,使我受益良多。我还受益于列奥弗兰克·霍尔弗德-斯特里文思博士的渊博学识。伯林本人以相当大的忍耐阅读并同意了我编辑的所有文章的文本,并在此过程中作了几处修改。如果没有他的秘书帕特·乌特金,我不可能取得这些成果;  
xi 同样,没有无比慷慨的赞助者 1990 年以来对我在沃尔夫森学院的研究的资助,以及布洛克勋爵促成我的这个研究员职位,这些成果也是不可能的。最后,我要感谢我在查托和文多斯出版社的编辑威尔·萨尔金和詹妮·乌格罗的帮助和支持;以及伊丽莎白·西弗顿、斯特劳斯和吉鲁克斯对打字稿的仔细阅读,使得书稿有了很大的改进。

亨利·哈代  
牛津沃尔夫森学院  
1996 年 4 月

xii

## 导 言

以赛亚·伯林的写作涉足了如此众多截然不同的思想和研究领域,有着如此不同的、有时出人意料的方向,大概有人不禁要问:是什么指导性观念最终指引或统一着他对这些彼此迥异的思想领地的涉猎?这个问题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容易回答;甚至在他的某些崇拜者眼里,这一问题似乎很不恰当,没有抓住要点。因为他们或许会说,伯林的成就的独特价值很大程度上正在于它显然缺乏任何一元化的野心或体系化的主张;他写作的范围和题材的无限多样性,以及随时准备用取决于问题本身的方式来对待相互尖锐冲突的信念以及它们的持有者等等,在开拓视野、使人摆脱有碍的偏见或教条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伯林自己就把“在碰到自己可能怀疑为真的东西的时候,倾向于压制它的”人形容为“教条主义”,而且他自己的观点毫无疑问是完全与之对立的。即便如此,而且尽管他始终显示了他的方法的开放性和客观性,似乎还是有可能在他的作品中分辨出他特别关注的东西和主题的轮廓,这使他的作品有了一种虽然相对不怎么突出或显著但同样令人难忘的内在一致性。第一眼看来好像离题或无关的思路,细察起来最后往往是一个更大的图案中的线条,一个包容更广的整体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它们可被看作一个由微妙地相互联系着的思想组成的错综复合体,而不属于某种死板的理论体系框架。不仅如此,我们所指的这一

复合体本身可以说反映了一些中心问题的存在,它们的决定性  
xiii 影响以各种方式体现出来,贯穿着伯林的思想事业。

这些反复出现的问题之一,就是对历史的本质和意义的关注,这是这本文集的主题。伯林常说自己现在不是也从来不是历史学家。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或许他是在某种公认的但有限制的意义上使用“历史学家”这一名词的。无论如何,事实是,他对思想史研究作出了独特的、杰出的贡献,在对人类过去所进行的这方面研究所引起的那些问题上,他也拥有独到而足资使用的知识。不仅如此,在他对十八和十九世纪思想的研究中,他不可避免地碰到了各种差别极大的关于历史进程的特点以及人们对其认识的理论。这样,在写作他的第一部著作《卡尔·马克思》的时候,他被迫不仅要抓住马克思本人对控制历史变化和发展的力量的非常有影响的描述,而且要阅读一些重要前人,如爱尔维修、孔多塞、圣西门和孔德的作品。这些作者都以不同方式抱有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当中流行的信念,即在我们增进对自然界了解的过程中已经证明如此成功的那类科学方法和范畴应该延伸到对人类及其历史的研究当中去。伯林在别处已经描述过,在研究这些以及类似主张的来源的过程中,他企图从内部理解那些困惑着提出这些主张的人的难题;过去的思想(他觉得)只能通过“进入”拥有那种思想的人的头脑以及他们所属的社会或文化背景来使之复活。然而,在遵循这一程序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的思路与他正在研究的思想家们所倡导的相去甚远,我们所说的那种想像的和移情的理解在自然科学当中并没有明显的类似物或对应物。另一方面,他是在两位思维特点非常不同的十八世纪思想家的作品里得到了共鸣。维柯和赫尔德在很多方面与他们时代的主导趋势明显相左,尤其是他们对待他们所  
xiv 认为的历史学家的题材的特性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这企图将

历史研究的方法同化到在原则上已经被误解了的科学方法中去。因为,就后者而言,我们只能获得它所研究的现象的纯粹“外部”知识,而我们与历史的具体现象之间的认识关系则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此外,我们有可能直接地或内在地把握历史人物的行为和创造中表现出来的心理过程;历史学家与他们想去理解的人之间的共同的基本人性使他们能够从内部确定是什么使他们研究的对象前进和行动,甚至当问题在于——像经常发生的那样——通过想像的努力重温普遍观念和最关心的事情都与他们自己的时代完全不同的别的时代或文化的内部生活的时候。维柯与赫尔德,虽然方式不同,都暗示这样一种方法对一切有意义的人类研究来说都是基本的,而这一历史实践观念极为重要,也是伯林——还有他们在二十世纪的仰慕者和追随者柯林伍德——一直强调的。

这些强调历史思考和理解的基本独立性的主张的影响,可以说是《现实感》中所提出的一些论点的由来,这篇文章中所作的历史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对比使人想起伯林在一些著名文章中对这一复杂的问题所给予的多角度关注。但这次他的思考路径在一些重要方面不同于其他一些讨论。在这里,他的视角有着更广的含义,涵盖了实践的和学术的众多问题。甚至这篇文章的题目都反映了这点,而且也部分地反映了对企图将构成人类生活的“大量未知因素”简单化处理或简化成随意的抽象术语的尝试的典型的伯林式怀疑,无论进行这些尝试是为了纯粹的理论目的,还是为了实施综合的政治性或社会性计划。他一直在表明自己非常清楚,发现某种能够解决人类实际境况中产生的种种难题的绝对可靠的公式或万应药方,不留下任何未解决的枝节问题或悬而未定的事情,这样的前景有着多么永久的魅力! xv 而且就此而论,他也强调了在现代——即大约从十七世纪末

起——这一雄心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在试图证明历史进程遵循不可避免的规律或统一性——它们被理解为对未来和过去都同样有效,所以既能预言未来又能解释过去——的努力当中。但是他依然认为这种魅力代表着一种我们应该拒绝的诱惑,而且它所引出的一些方案的根本困难来自于超出历史解释和方法论界限之外的误解,最终深深地扎根于一切人类生活和经验的深层肌理。

如伯林指出的,他所考虑的那类对历史的理论化并不遵循单一的模式。从建立在机械地设想出来的规律性上的历史记述,到那些援引“有机的”或进化的发展观的历史叙事,应有尽有。但是在这本书里,他所关心的不是对这一类型中的不同具体例子的区分和评论,而是要质疑这样一种观念:建立一个能够将组成历史进程的各种各样因素纳入一个统一图式的、有规律可循的或自成体系的理论。在后一点上,他以赞成的态度提到了托尔斯泰,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这个问题上所说的很多话与这位俄国作家在《战争与和平》的结尾所表达的历史观在语气上遥相呼应。托尔斯泰不仅对迄今为止人们炮制出来的各种历史和社会哲学当中他所认为的粗略的简单化和乏味的一般性表现出了相当的怀疑,他还进一步暗示,所有涉及使用纯粹的理论家们所喜爱的那类抽象概念和图式的方案最后注定要失败,它们的本质天生就不适合理解“极微量因素”的连续体——一系列无可计数的、微小的和相互联系的行为和事件,它们组成了人类的生活和经历。在伯林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当中,人们发现他对以前的“伪科学性的关于人类行为的历史和理论”持一种类似的批判态度,而且类似地(但不完全相同)强调以什么方式复杂的历史材料才有望拒绝被强加上原本应用于根本不同的问题和研究领域的方法步骤。

托氏和伯林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并不令人惊讶。托尔斯泰作为一名创造性作家的特殊才华,使他在伯林眼里显得特别能够领悟人们实际经历和了解到的人类现实生活的丰富和多样:事物和人的无限多样和独特,社会交往和个人关系中所涉及的微妙的情感逆流,社会生活表层下盘桓极深的对自己利益的关注和目标的混乱——托尔斯泰非凡的观察力和想像力抓住了千百万这类现象,这使他的眼光能够穿透自称历史阐释家的那些人所描绘的平滑、规则的历史轮廓,看到它们所掩盖的不均匀的、常常是混乱的真实经验的细节。众所周知,托尔斯泰的这些方面的特点在伯林眼光敏锐的研究《刺猬与狐狸》中有生动的描绘。但他在那篇文章中的主要任务,是对比托尔斯泰的艺术洞察力和才能,与其观点和个性的另一个颇为对立的方面,即渴望某种一元论的或统一的真理能够完全超越折磨着我们世俗生活的问题和困惑。而在这里相反,他是想表明这位小说家特别的文学才能对这篇文章主题的相关性,将它们不仅与致力于重建过去的历史学家,而且与参与世界实际事务的政治家以及所谓的“实干家”联系起来。因此,在《现实感》之后并对它的一些观点作了详细阐述的姐妹篇《政治判断力》中,伯林指出,与想像性作家的思想在某些方面类似的特点可以说在历史研究以及施行他所谓“治国术”的过程中都起了作用。就像受过训练的历史学家一样,能干的政治家也需要一种发达的能力以“用并非一概而论的方式评估具体情况”;一种经过精心协调的对社会生活不断变化的轮廓或层次的敏感,而且与此相关,还能本能地“直觉”到什么在实际上是可行的,在复杂的、常常难以把握的具体事实或环境中什么又是互相结合的,这些永远都是杰出的政治领导人超出常人的一些特点。伯林发现,那些“实践智慧”或天赋往往被那些系统化历史的人当作是随意的、“前科学”的方法,认为基

xvii

于理论原因已经不能再被接受,并且需要彻底改造或替换。但伯林也指出,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改进方法,很少能让人觉得是对这一需求的令人满意的回答,他们所换取的那些乌托邦式的实验最后造成的出人意料的结果——非常有讽刺意味——历史本身已经让我们再熟悉不过了。

总而言之,这两篇文章气势宏大,证明了作者非凡的知识范围及让人深受启迪的广阔视野。它们最初写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中多有暗指的臆想社会理论和蓝图因此可以部分地看作反映了一个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极其敏感的时代最为关心的一些问题,而这种意识形态在政治领域中的影响持续至今。尽管如此,如果认为这些暗指在伯林的整个思想中仅有一些有限的或短暂的影响,那就错了。几乎从一开始,他就提防着一种被错置的“科学主义”的内在危险,以及它易于造成的界限的模糊;早期对认识论和语言哲学中的简单化倾向的抗拒,在某些方面预示了他后来对政治和社会理论中有影响的学说的反对。他一直认为,对促进了自然科学成就的那些方法表示敬意并努力加以学习,是正确的乃至可敬的;但将这些方法不加区别地延用到不相关的研究领域或很不相同的经验层次,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们看到,他认为某些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以及和他们采取同样办法对待人类事务的人就是后一种情况。但这并不是他不满足于这些思想家的观点的惟一理由,他在作品中时常流露出来的更广的怀疑,不能不让人思考他对整个启蒙运动的态度。在本书所收的其他文章中也可以感觉到他的一些本能的半信半疑态度。

实际上,而且不同于有时人们所以为的,伯林并非不愿意表  
xviii 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公认的复杂立场。他公开赞扬了启蒙运动的代表们有勇气反对他们当时的许多罪恶,包括无知、压迫、

残酷和迷信,而且拥护理性、自由和人类幸福等理想;他简洁地对一位访问者说<sup>①</sup>:这把他推到了他们一边。但与此同时,尽管他对他们所代表的东西甚为仰慕,他还是认为他们倾向于教条地将假想——其来源常常是传统的——当作真的东西来接受,而这些假想并非不证自明。而且,根据他们所声称的对经验原则的尊重,他们本来应该质疑其正确性的。这其中包括关于统一的、基本不变的人性的各种具体观念,还包括各种紧密联系的、对存在某些人类在其生活过程中可以一致实现的普遍价值的信念。这些先入之见所引起的一些问题在《浪漫主义革命》中得到了讨论。伯林指出,十八世纪晚期浪漫主义的出现造成了当时思想气候的一次根本性变化,公认的标准和规范的客观地位受到了主观主义学说的挑战,这种挑战的方式在伦理学、美学和政治学领域有着巨大的反响。在为这一引人入胜的讨论做结论的时候,伯林指出观念之间的冲突的一个长期影响是,我们今天发现自己分别继承了两大传统,并往往“不自在地来回换脚”。但是他同样主张,浪漫主义运动所引入的新颖且具有颠覆性的观念无可争议地深化和丰富了对人和社会的理解,既暴露了启蒙运动遗产中的局限和缺陷,同时也为到那时为止还处于欧洲想像范围外的思想和情感开创了新的可能性。

伯林对以上这些不同观点的探讨,是与渗透他整个思想史研究方法的那种敏锐与移情的结合协调一致的。一方面他显示了一种非凡的能力,对那些常常与他个人最为同情的观点相反的思想和文化观念,可以做到从内部把握并领会其力量。另一方面他一直能迅速认识并准确地指出一些他已经作了非常生动的描述的立场当中潜在的不祥含义:不仅仅是潜伏在属于他所

xix

---

① 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伦敦、纽约,1992),70页。

说的反启蒙运动的各种学说当中的非理性主义和侵略性民族主义的幽灵。由于后一种原因,关于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文章快要结尾时的文字表明,他希望在善良的沙文主义和具有毁灭性的沙文主义之间划定界限,它们都是民族主义可能采取的伪装。他评论道,泰戈尔在这个问题上和在别处一样,努力不过分简单化地说出真理,也许正是如此,听从他的人相应地比较少,因为正如美国哲学家 C. I. 刘易斯所说的:“没有什么优先的理由认为,当我们发现真理的时候,它会是有意义的。”伯林带着赞赏的态度引用了这句话。尽管如此,在他自己所写的文字中,的确可以说真理最后都被证明总是有意义的。

xx

帕特里克·加迪纳